

消费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张子麟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
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B13JJ017）

消费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张子麟◇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子麟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 - 7 - 5218 - 0322 - 8

I. ①消… II. ①张… III. ①消费经济学 - 研究
IV. ①F01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8579 号

责任编辑: 周国强

责任校对: 杨 海

责任印制: 邱 天

消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张子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4 印张 250000 字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218 - 0322 - 8 定价: 7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 举报热线: 010 - 88191661)

QQ: 2242791300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1537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言

对消费问题的时代追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认识，共同促成了这本小书的面世。我们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同样，消费也从模仿型排浪式转向个性化、定制化。曾经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边缘化现象严重。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这种边缘化的现象得以扭转，尤其以习近平总书记五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话为鼓舞，学界掀起重视政治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消费问题或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其说是一门学科范式，倒不如说是一种认知方式。那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消费？首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消费之所以能够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它必须是生产关系的承载者、中介物或关系源，否则政治经济学分析就无从谈起。其次，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权利问题，然而地位和权利都是相对而言，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当然这也不是政治经济学学科所独有的，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存在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必须从劳动人民的角度来考量消费的意义和价值，进而提出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诉求。最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生产关系，但是它作为一个抽象的学术概念并不是一个可视化的存在，对它的考察不仅要借助思维力，而且还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在具体的消费活动中消费的主体与客体使得抽象的生产关系具体化和明晰化，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操作路径，同时消费现象因其自身的广泛性和延续性也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材料。

提到政治经济学分析，就不能不说马克思。马克思以“批判”为名从政

治经济学分析注入了持久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虽然他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没有设置专门的章节来讨论消费，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表达丰富而独特的消费思想。马克思讲，“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行为，除了它又会反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在马克思看来，研究消费的角度很多，如国民经济学、商品学、工艺学等都有自己的角度，而“它（消费）反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正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独特视角。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论述了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聚焦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殊样本，指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巨大消费悬殊正是劳动力与雇用资本尖锐对抗的现实表现；如同生产一样，消费不仅消费着商品，而且也消费着（再生产着）生产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不仅在内容上为我们认识消费现象、洞悉消费本质提供了思想指引，而且在方法上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消费问题给予诸多启示和借鉴。

今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各行各业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庆祝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这四十年的进程中，人们的消费对象、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体验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应该说，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引领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道路的漫长，而是方向是否清晰和明确。这或许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之一。总书记告诫我们，“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人口是消费的主体。人口规模的增加当然会增加消费的基数，但是人口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更耐人寻味。当下讨论最多的当属老龄化的隐忧以及劳动人口下降的预期，然而分析表明，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划分在本质上还是以是否参与劳动为标准，在这里劳动不仅是收入的来源以及消费的基础，更表现为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少子化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趋势。家庭作为维持家庭成员基本需求的生产与消费的共同体属性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专属性物品、个性化服务、小众市场的形成以及在一些领域消费的利己主义倾向明显。不仅家庭的小型化为消费决策节省了时间，而且女性在家庭消费决策的话语权也大大提高甚至超过了男性，尤其是在诸如童装、玩具、教育等儿童消费市场上表现明显。虽然城镇化进程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贡献，然而由于地域分置、城乡分割、市民分野等因素，城乡家庭在消费方面还存在很多惯性差异。由于收入水平、

品位偏好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不同，城镇家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费分层。而介于城乡之间的近3亿农民工，因其变异的家庭结构而引致出一些特殊的消费现象。

财富是消费的条件。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无论是绝对的收入还是相对的收入，当期收入还是跨期收入，抑或确定性收入还是不确定性收入。然而分析表明，由收入的迭代累加而形成的资产，才是收入决定消费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家庭资产的配置效率表现为不同的收入水平，并决定了一定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层级又反作用于家庭资产的配置效率，并决定了该家庭一段时间内的收入水平。消费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行为”，而且“它又会反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从社会再生产周而复始的角度来看，消费有时候也表现为投资。消费者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纷繁芜杂的商品市场，更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资产市场；不仅要追求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且也要实现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最小化。关注财富与消费的这种相互加强机制，是理解城乡间差距、城乡内部差距的重要方面。虽然中央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是数据表明住房依然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而且在其他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合理配置住房资产依然是中国家庭对抗通货膨胀、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不二之选。实证结果表明，在房价高涨的背景下，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明显。

产业是消费的支撑。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市场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信号来实现自动出清，由此厂商依据消费者的需求信息来调整自身的投资和生产结构，进而实现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演进。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的开发和形成不可能是消费者单方面推动的结果，亦不是买卖双方交互的“演奏”，而必然是各种因素协同演进的过程。其中离不开科技进步的支持、工业化进程的自我逻辑以及宏观政策的引导等。“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更是凸显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作用。中国社会从“信息的消费”到“信息+消费”快速升级和转化，也离不开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而制止房价的过快上涨，也不是通过增加供给的市场调节来实现的；在新常态下党中央提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解决供求矛盾的主要着力点，这都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同时也确证了，政治经济学对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

拙作既是我瞄准以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消费问题这一学术方向的阶段性小结，也是坚定并深化这一研究方向的初始积累。如果说这本小书侧重于

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影响消费的结构因素，那么笔者下一步要做的研究就是，以河北平山的经济社会变迁为考察对象重点解析消费变迁的微观意义。

限于能力和材料的掌握程度，书中必然少不了错误、谬误和疏漏之处，在此也恳请各方专家、学者、同仁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张子麟

2018年8月11日初稿

2018年12月29日修改

第一章	消费与政治经济学 / 1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流变 / 1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 9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分析消费的独特视角 / 16
第二章	消费研究的思想遗产 / 28
	第一节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吗? / 28
	第二节 消费的推手是顾客还是商家? / 35
	第三节 消费是认同还是区隔? / 38
	第四节 消费的指向是物还是人? / 44
第三章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 52
	第一节 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形成 / 52
	第二节 马克思论“消费一般” / 59
	第三节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消费 / 64
	第四节 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71
第四章	人口结构与消费 / 77
	第一节 年龄结构与消费 / 77

第二节 阶层结构与消费 / 86

第三节 家庭结构与消费 / 89

第四节 城乡结构与消费 / 94

| 第五章 | 财富结构与消费 / 102

第一节 家庭财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综述 / 102

第二节 中国家庭的财富分布状况 / 106

第三节 财富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机制 / 116

第四节 住房对家庭资产及其消费决策的影响 / 121

第五节 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建议 / 127

| 第六章 | 产业结构与消费 / 131

第一节 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 / 131

第二节 信息消费 / 143

第三节 居住消费 / 152

| 第七章 | 消费向何处去? / 167

第一节 新常态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特征与对策 / 167

第二节 新时代中央对消费需求的科学论述 / 177

第三节 学者们对未来消费的展望与思考 / 188

参考文献 / 200

后记 / 216

消费与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这个称谓，不仅仅指代了理论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也不是许多人眼中政治与经济的简单综合。自16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这个称谓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被提出、使用、批驳、修改，正是在这样一个概念流变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框架得以彰显；也正是在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得以传承。本章通过考证“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概念的产生和流变过程，探析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并借助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学术传统重新审视消费问题。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流变

“政治经济学”起先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考量财富管理时提出来的。早期它作为“原初的社会科学”，曾以广阔的视野研究了社会体系，从而为后来的社会科学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此后，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先是马歇尔完成了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改造，之后又是伴随着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回归，表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在经历了“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之后，学者们逐渐对政治经济学独特的学术优势和研究视角形成共识。^①

① 本节的撰写主要参考《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词条，详见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陈岱孙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卷第60~61页和第三卷第968~974页；[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王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导言第1~5页；等等。

一、“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与所指

在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意思。19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把西方著作中的 economy 译作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后来，中国沿用了这种译法。“econom”一词源于希腊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因而 economics 的传统含义是“家政管理”。拉丁语 oeconomia 同样意味着家庭事务管理，后来它的含义扩展为一般性管理，包括演说和写作的规范化。法语 oeconomie 或 économie 接受了拉丁语扩展了的管理含义，并加进了政治含义，用来表示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

“经济”，在希腊语中本来是指对家庭事务的管理，特别是指家庭收入的供应和管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分析由“主人和奴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三部分组成”的家庭时使用这个词。“经济学”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经济学》一书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改善家庭的艺术。实际上从13世纪一直到18世纪后期，“经济（学）”一直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供给家庭的需要”，“为人民提供充裕的收入或生活资料”；二是“供给国家的需要”，通过对工业和贸易有远见的管理使整个社会更为富足，进而补充公共财富。为了区别于“供给家庭的需要”之不同，“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政府的艺术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中财政金融部门的一个专有名词^①，显然是“非常需要政治家注意”的“政府管理的一部分”。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社会团体的形成，用公共财产满足公共需要成为必要，管理的重心逐渐由家庭财产转向公共利益。如何征收和管理属于公共所有的国民收入，成为政治家们的一门重要知识。首先是16世纪查理五世的大臣们用积极的国家财政管理行动，框定了政治经济学发生认识论原理，即以公共利益作为行政方针，关注国家财产增值。西斯蒙第（Sismondi）称他们是实现政治经济学第一次革命的功臣。其次是17世纪亨利四世时期的法国，随着国家机构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范围的扩大，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提出准备了实践基础。通常认为是法国学者蒙克莱蒂安（Montchrétien）于1615年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页。

一词^①，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家庭管理的范围，涉及国家的经济管理问题。随后 1691 年英国经济学家配第（Petty）不仅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还使用了“政治解剖”一词来描述他对爱尔兰经济的分析，并且使用“政治算术”一词来比较国家间的相对优势。

尽管政治经济学一词继续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含义，但它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组织的精确表述却是由重农学派建立的。魁奈（Quesnay）用该词概括对财富的性质、再生产和分配的讨论，甚至米拉波（Mirabeau）将政治经济学说成是“由关于农业和公共管理与财富性质和取得财富的方法的论文构成”的。在以后的几十年，后一类含义的政治经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加进了“学科”含义，而且到了 18 世纪 70 年代，政治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

二、政治经济学如何走向科学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rart）于 1767 年把“政治经济学”在自己著作的书名中使用。他在本书的前言中说道，如同“经济通常是满足家庭需要的一门艺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如何保证所有居民得到维持生存的必需资金，消除可能引起生活不稳定的各种因素，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一切必需品以及居民就业……用自然的方式使公民间建立相互依赖的互惠关系，以便通过他们各自的利益引导他们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1771 年，维里（Verri）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思考》一书，他在序言中把这门新的学科称为政治经济学。斯密（Smith）虽然未将“政治经济学”用作标题，但是在 1776 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序论及全书设计”中提及“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学说”，并在第四篇开端把它定义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并提出双重目标“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以及给国家和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斯密在其他地方还表示，他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学问，就像重农学派曾经指出的那样，它是一门关于财富的性质、再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科学。

正如把政治经济学与提供物质财富联系起来一样，有时候也将其与法律

^① 另有一种说法是，迈耶尼·蒂尔凯（Mayerne Turquet）在 1611 年首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由于当时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与该时代很相称，所以金（King）推测“政治经济学”一词或许使用的还要早些。

学科相联系。边沁（Bentham，1793）简洁地说“政治经济学可当作一门科学，也可当作一项技艺，但当科学运用于指导技艺时，两者可视为同一。”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麦克库洛赫（McCulloch）把政治经济学确定为研究依法管理生产、分配、消费和商品或者劳动产品交换的体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euart Mill）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规律来自人类在财富生产中各种行为的组合，在一定范围内这些现象并不因追求其他目标而改变。这种见解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他后来所写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以及从中推论其实际结果”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之中。凯恩斯把这句话精炼为“政治经济学……是对财富现象规律的详细说明”。

19世纪中叶，出现了对政治经济学上述含义的两种批评。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确定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和探索“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恩格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①这种观点保留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批评了它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是永恒的“一般生产”，而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因而只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不仅系统地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强调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马克思指出，“生产一般”是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不能用它来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②“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③由此，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分配转向了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④也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重农学派的理论贡献^①，称他们是政治经济学的鼻祖。

另一种观点，建议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赫恩（Hearn，1863）建议将政治经济学改名为财富学或努力满足人类需要的学说。较早放弃“政治经济学”而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的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年，他将自己出版的成名作取名为“国民经济学原理”；1883年，他又将自己出版的第二本著作取名为“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他坚决反对历史学派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政策来代替理论经济学，他认为经济现象是有规律的，理论经济学应特别注意“关于生产物与其生产要素的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而不是过多的研究经济政策。在用“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转变中，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政治经济学一词太富政治色彩和阶级性味道，并认为经济学不应研究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②，是超阶级的，是研究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事务的学问。^③至此，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由古典的分配和增长研究转向了‘新古典’，只考虑单个消费者行为和企业竞争性市场中的运作”；“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④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边际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马歇尔以其学术地位和《经济学原理》的影响，最终完成了由“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到20世纪来临时，新古典经济学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⑤

实际上，在以“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大多数学者的思维是矛盾的，罗宾斯（Robbins）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一方面，他想以边际主义的分析范式重新整合政治经济学，通过发现欲望与稀缺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人类的行为，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理论性的和有实证作用的知识体系”；

① 马克思认为，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学派并没有像重商主义一样，被商品交换的外观所迷惑，而是从流通领域转向了更深一层的生产领域，认为只有生产才是创造财富的，这显然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了一步，因此马克思将其称为“标志着科学新阶段的体系”。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② 如麦克劳德（Macleod，1875）提议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关系的规律的科学”。

③ 杨光英、张瑞恒：《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④⑤ [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另一方面，为了将诸如垄断、保护政策、计划和政府财政政策等应用性的课题，纳入他的研究论文之中，他又倾向保留“政治经济学”名称。所以，熊彼特（Schumpeter，1954）曾告诫说，“政治经济学对不同的作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有些情况下，它表示现在所说的经济理论和‘纯’经济学”。

事实上，国外的很多学者借用或沿袭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范式。多布（Dobb）坚持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反对“经济学”这个新名称，他认为这两个名词的争论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和行为，明确回答最根本的实际问题。”^① 巴兰（Baran）也主张用“政治经济学”，因为“了解利用社会剩余的规模和方式的相关因素是一个问题，而在纯经济学中却没有涉及。”^② 而且诺思（North，1981）也坦言，“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都包括在内：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③ 尤其是在探索剩余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努力从实用性和理论性方面复兴古典传统的现代经济学家来说，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一个很合适的标题。

可见，政治经济学学科从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取向的学术分野。一种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更重要的是它沿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结构、制度、历史及政治分析的传统和视野，冠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等名称；另一种则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称谓，蜕变为“经济学”，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该学派的主流。而在中国语境中“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书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神话”，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

① Dobb, M. H., 1937.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London: G. Routledge&Sons, P. 7.

② Baran, P. A.,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 131.

③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

问题，政治因素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二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到 70 年代结束，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的打击。这时，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也有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等。

实际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变化，那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在这一思潮中，一方面，经济学家突破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充分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对于诸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被部分学者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有学者称为“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在此意义上，新政治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利用现代经济分析形式的和技术的工具来考察政治对于经济的重要性的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把按照理性概念来分析经济当事人过度简化的理论，与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理论结合起来，用结构知识来改进对经济当事人的分析，用经济当事人的知识来改进对结构的分析，避免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相互独立所造成的许多研究缺乏独创性。^① 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而是反映了一种研究取向。虽然这归类于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的课题，但是，更明确地说，新政治经济学有时候被简称为“政治经济学”，但是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区别。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恢复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传统，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以破解经济发展之谜为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是根本动力，有的把发展之源归结为物质资本积累或人力资源开发，有的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资本、技术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做出详尽的定量估计。同样，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古代帝国的兴衰也语焉不详，把经济发展的历程简单概括成为“弱肉强食”，对无数复杂的经济演化过程也未做深入分析。不论这些分析如何精细、巧妙和实用，但都未能说明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理解经济发展不能仅考虑技术、经济等因素，而必须要关联社会、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

^① 陈振明、黄新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第 19 页。

因素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边际替代关系和成本收益关系。在学科形态上,表现为制度主义、政治行为分析和法经济学研究的兴起。

也如有的学者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实践变革力,其独特优势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始终坚持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互动的传统,对经济所关涉的思想维度、政治维度以及历史价值维度的偏重,使得单一的经济学分析视角,直接转入综合系统分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学术资源中,从而使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在考量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运动的同时,对追求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亦给予高度关注。^①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了许多制度因素,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制度思想犹如散落的珍珠而缺乏一条“红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虽然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但却把十分重要的制度因素抽象掉了,就像画龙而没有点睛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学的取长补短,并重新确立了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经济学不应只停留在对某种现象或行为是否“经济”的判断上,而必须做出帮助我们认识该现象或行为的“政治经济学”贡献。塔洛克(G. Tullock)和麦肯齐(R. McKenzie)据此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心智技能,它包括经济学家关于人类行为特征的特有看法。简而言之,即是经济学家据以研究问题的一种思想过程或方式,而不是一组简单可识别的、把经济学家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问题”^②。

可见,政治经济学再度恢复了对人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行为)的兴趣,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的研究传统,但同时采用了新古典分析工具,突出了微观分析,修正了理性假定。这些令人不由得想起凯恩斯说过的话,经济学家“必须兼具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哲学家于一身……他必须完全考虑到人性或者他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兼具‘目的性’与不关心两种心态;他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地超然与脱俗,但有时候又必须像政客一样地入世。”^③

① 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月,第4页。

② Tullock, G., McKenzie, R., 1985. *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 R. Irwin Inc, P. 5.

③ 转引自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页。